

首都体育学院督导通讯

2021 年学科建设专辑

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教师工作部 教务处、研究生部 督导组编

2021 年 12 月 8 日

【发展动向】

- 2050 年教育宣言：学会融入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30 年
- 学位中心召开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指标权重专题研讨会

【学科建设】

- 我国研究生培养政策范式变迁与思考——基于 1949—2020 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的理论解构与机制重构
- 影响博士学位授予质量的导师因素分析和对策

【队伍建设】

- 清华人谈：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全面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
- 大学者，大师“育才”之谓也——从“双一流”建设与人才培养谈起
- 导师直接关系研究生培养质量：应兼顾好学业指导与做人引导

【授业之道】

- 如何培养研究生的研究精神
- 培养研究生，导师应先学生之忧而忧
- 教学比天大

【发展动向】

2050 年教育宣言：学会融入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拟定于 2021 年 11 月召开的第 41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将发布“教育的未来”倡议。作为“教育的未来”倡议的背景资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研究发布《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报告，提出七个方面的教育宣言，勾勒出 2050 年后的教育。宣言呼吁，教育必须发挥关键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了解世界到采取行动，再到与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实现教育范式的根本转变。

一、前言

当今时代，我们生活的世界正面临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不平等、社会碎片化和政治极端主义问题持续存在，不断侵蚀着社会凝聚力和既有机构制度的公信力，将许多领域推向危机的边缘。数字通信、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进步蕴含着巨大的潜力，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生活、工作、交际、处理知识和学习的方式。这些颠覆性技术既为改善人类福祉开辟了广阔前景，又引发了严重的伦理、社会和政治关切。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由各界思想领袖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发起“教育的未来”倡议（Futures of Education initiative），旨在通过重构教育来改变世界。拟定于 2021 年 11 月召开的第 41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将发布“教育的未来”倡议。作为“教育的未来”倡议的背景资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研究发布《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Learning to Become with the World: Education for Future Survival）报告，提出 2050 年七个方面的教育宣言。该教育宣言基于三个前提：首先，人类已经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威胁着地球上的生命，而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性是一体的，我们是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次，即使意图可能是好的，任何通过继续将人类与世界其他部分分离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尝试都是妄想和徒劳的；最后，教育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在思考人类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位置和作用方式中实现范式转变，进而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从了解世界到采取行动，再到与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未来的生存取决于我们实现这一转变的能力。

二、七个教育宣言

第一、到 2050 年，教育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被批判性地重新评估与调整。我们保留了先前教育中人文主义使命的最好方面——促进正义，但将其扩展到超越单纯的人类或社会的专属框架。

伴随着对正义的生态重构，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评估了教育的人文主义知识传统。在警惕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今天，我们积极抵制以人类例外论作为前提，拒绝人类统治地球的危险主张。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与人类“进步与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式的开采、生产和消费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不可否认的是，人文主义教育被一种短视的、以人类进步为幌子的持久经济增长所蛊惑，对教育在确保“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信仰正逐渐式微。我们不得不承认，通过重申和延续以人类为中心和人类例外论的妄想，教育不仅无法助力问题解决，而且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例如，人类可以无休止地对世界采取行动而不受惩罚——要么开发其资源，要么随心所欲地“改善”它。

为了巩固一种超越人类的正义观念，并满足教育学习如何共同生存的新宪章，我们已经找到了生态协调的替代方案，承认所有地球生命、实体和力量的集体能动性和相互依存性。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学者为回应“人类世”（Anthropocene）而对人文主义缺陷的批判，抛弃了支持“一个世界”框架的欧美认识论，该框架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一直在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超越西方视野”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南方认识论”和其他非西方思想传统的“多元化”框架。这些思想传统假定世界中存在人类以及人类以外的无限世界，它们生机勃勃，互相依存。通过学习和教授多元化原则，我们扩展了对正义概念的认识。

第二、到 2050 年，人类根植于生态系统之中的观念将深入人心。我们不仅是社会性的，更是生态性的生物。我们已经消除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所有的课程和教学都牢固地建立在生态意识的基础之上。

21 世纪初，一些人开始注意到科学家的警告，即我们危险的碳排放水平正在引发全球范围的生态系统崩溃，最终将威胁到我们。但我们仍然坚信人类的智慧能够“解决”或至少“管理”这些问题——就好像我们还有一只脚在这些生态系统之外。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停止自我分裂，摆脱双重错觉，即生态系统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和维持人类生存，我们可以通过“管理”它们以达到该目的。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命运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要素和力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接受了生活和学习是生态存在的一个方面。在消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的学科界限之后，我们以一种全面的生态意识来实践教育。

第三、到 2050 年，我们已经不再使用教育作为传播人类例外论的工具。我们在超越人类、集体和关联的能动性概念指导下开展教学工作。

既然我们已经打破了现代学校教育中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推崇，我们就不再推崇人类例外论及其排他性的人类理性和能动性的“笛卡尔逻辑底线”。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些妄想的逻辑证明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等级和剥削关系，才导致了“人类世”。我们也认识到，现代教育系统地践行了人类例外论，将教师和学生定位为主观的全知主体，将“外面”的世界定位为有待研究和了解的惰性物质。到 21 世纪初，对超越人类、集体和关联的能动性的认识不断加深。然而，这些对能动性超越人类的重新认识，在教育政策和学校教育的日常实践中获得吸引力的速度要慢得多。直到 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人类世”的影响真正开始显现，我们才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利用地球的变革力量，因为我们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为此，我们开始了一项巨大的任务，根据超越人类、集体和关联的能动性概念，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课程和教学。我们不再依赖人类的智慧和技术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最终办法，而是正在学习如何成为地球上生命的众多参与者、创造者和塑造者之一。

第四、到 2050 年，我们已经抛弃了教育的人类发展框架，不再拥护个人主义，而是培养集体的性格和乐于助人、善解人意的人际关系及超越人际的关系。

在教育领域，发展逻辑最初通过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儿童研究运动提出，这场运动要求对儿童进行广泛的科学观察。到 20 世纪末，以儿童为中心的学习已经成为一种受人尊敬的发展主义概念，并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初。幼儿和小学课程的设计针对儿童的需要和兴趣，并契合学生独特的特点。教育加强和支持儿童学习者成为自主的、自我调节的、理性的和能动的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儿童或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方法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借鉴了看似“进步的”西方价值观，如民主和个人自由。几十年来，国际发展机构经常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的“最佳实践”加以推广，它在各种情况下取代甚至有时消除了替代性的教育实践。

随着“人类世”的影响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显现，教育显然并没有帮助年轻的学习者为面临危险的未来生态做好准备，需要一些与 20 世纪人类发展框架下所指导的过时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的东西。在这个阶段，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了质疑。从 2018 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学生运动将全世界数百万人带上街头，宣布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一场生态灾难，并要求各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对气候变化采取紧急行动。他们可以看到，教育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否则教育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呼吁为未来的生存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教育工作者开始倾听并动员支持。在学生们的坚持下，我们现在已经把教育从无限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双重逻辑中脱钩，重新整合到生态生存的逻辑中。认识到在“人类世”，人类与人类以外世界的命运和未来是不可区分的，我们围绕着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原则重新调整了教育，使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成为地球生态社区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教育实践的特点是对“他者”（Earth others）开放——无论是其他人类、物种、土地、祖先，还是半机械人（cyborgs）和机器。这些开放的关系构成了一种受欢迎的和修复的立场，“欢迎惊喜，接纳希望，建立联系，容忍共存，并为新事物提供关怀”。

第五、到 2050 年，我们已经重新认识到我们生活和学习的这个世界。我们的教育学不再把“外面”的世界作为学习的对象。学会与世界融为一体是一种情境实践，也是一种超越人类的教学合作。

在已受损的地球上，负责地、恭敬地教授和学习生活艺术的新宪章要求我们挑战教育中最基本的二元结构——“主体/客体”的划分。在整个 20 世纪到 21 世纪初，主客体的划分一直没有受到挑战。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育理性的人类主体了解外面的世界。世界一直是研究的对象，而人类一直是认知的主体，学习外在的世界。在新宪章中，教育者根本不可能继续利用和再现这一主客体划分。现在，我们在生态意识的引领下继续前进，它坚定地将所有人类重新定位为生态局内人，并早已嵌入到生态系统中。比较教育、人工智能、高等教育等各行各业的教育者也在努力超越主客体鸿沟，重构学习任务。我们认识到，通过调动好奇心、从世界上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教与学的不仅仅只有人类。这也意味着我们已经采用了“情境化”的教学实践，它拒绝了“超越的承诺”，而这种承诺只在学习中嵌入。通过情境教学法，我们坚持与真实受损的地球和所有的地球栖息者一起学习“与麻烦共处”。情境教学法的主张已经成为一种对“学习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坚持。我们正满怀热情地与我们共处同一世界的人一起学习，作为共同改造世界的一种模式。

第六、到 2050 年，我们重新分配了教育的任务，赋予它一种宇宙论的使命。教育远远超出了主张普遍主义和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权观点。

教育工作者现在完全拥护宇宙论 (cosmopolitics) 的原则，承认多元性，或承认许多不同世界的共存。我们不再坚持可以追溯到 1945 年联合国成立时被广泛接受的人文主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用语”，以及其最近重复的“新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宪章不仅未能实现世界和平，而且还揭示了“人类解放的人道主义定义”根本不足以界定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宇宙论教育的方法不是从多个角度揭示一个单一的世界，而是既承认相互联系的世界的多样性，也承认我们在包含不同知识、实践和技术的多物种生态中的纠缠。几十年来，我们从与动物、物质和机器的融合中学到了东西，同时我们也忘记了如何成为“西方理性的化身的人”。这将教育空间转变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多元宇宙”的关键部分，在这里，每个人和每件事现在都可以为表达或制造多元宇宙的过程作贡献。到 2050 年，宇宙论的实践已经渗透到教育、文化和政治中，以至于联合国成员国不再满足于“仅仅是人类……作为唯一可接受的成员”。在 2050 年 9 月 20 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将有几次会议专门讨论联合国以人类为中心的逻辑的局限性，以及克服联合国对宇宙论狭隘拥护所必需的哲学和组织变革的紧迫性。激烈的讨论后，一致决定以联合国的名义，把“联合国” (Nations) 改为“自然之国” (Naturescultures)，这标志着对宇宙论原则的全面接受，将其作为一种实践，也作为一种在一个受损的地球上共同生存与死亡的艺术。

第七、到 2050 年，为未来生存的教育目标已经引导我们在这个被破坏的地球上优先考虑集体恢复伦理。

围绕我们星球的未来生存，我们现在已经完全重新设想和重新配置教育。我们将教育实践重新定位在共同的世界，因为我们不再区分社会和环境，也不再将教育作为一种专属于人类的活动。在致力于寻求代际和多物种正义的激励下，我们在受到破坏的地球上，已将教育的目标从人文主义宪章转变为生态正义的一种。与所有这些转变相一致的是，我们采用了一种全新的道德模式，这是集体的、超越人类的、具有恢复性的模式。21 世纪 20 年代初，人们普遍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失败了。我们可以通过教育绿色一代和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找到技术解决方案来最终“拯救”地球的假设，也是基于人类例外主义的错觉。这样的项目和愿景并没有满足时代的关键挑战。通过放弃人类拯救环境的宏大幻想，我们现在能够专注于更为温和的目标，即共同致力于包括人类和人类以外群体的共同繁荣，以及一起修复我们受损的世界，即便只有部分修复是可能的。我们终于吸取了教训，要实现生态正义，我们必须注意与他者的关系。在寻求生态正义的过程中，通过认识到人类与地球上人类以外的他者的关系的价值，我们现在采取了一种道德立场，从根本上偏离了假定的人类掌握和控制的道德高地。这种道德立场对联合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接受了其新名字和宇宙论原则，注意到世界关系的持续性，并努力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在毁灭中可以共同恢复什么样的世界？

很明显，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通过共同化的过程来实现：当我们重组世界时，人类与地球上的他者融为一体。

三、结论：学会与世界融为一体

“人类世”不仅预示着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而且也证实了人类和自然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密不可分。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把“人类世”作为一个紧急的警钟。它要求我们揭露将教育作为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之论述是一种基于人类高度自我分裂和人类例外论妄想的神话。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来生存的思辨性愿景宣称，有必要与人文教育彻底决裂。我们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转变：从倡导人文主义到践行生态意识；从争取社会正义到争取生态正义；从认识作为社会的人到认识作为生态的人；从坚持专属的人类能动性到认识到并非只有人类具有能动性；从鼓励个人发展到培养集体性格；从把教与学理解为人类独有的活动到把接近世界关系理解为内在的教育；从教学生（作为主体）认识世界（作为客体）到在我们共同的世界中与他者学习；从采用普遍的立场与标准到考虑多元的视角；从倡导人类的世界主义到理解超越人类的宇宙论；从培养人类的环境管理到参与超越人类的集体修复伦理；从学习如何更好地管理、控制或拯救世界，到学习如何融入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要继续下去，我们一致认为，是时候让人类放弃崇高的自我幻想，是时候将我们自己重新定位为地球上的生命了。坚定而充分地基于我们宇宙论的世界，拥有完整的生态意识，我们是这个地球上许多相互依赖的生命、实体和力量之一。只有在这些超越人类共同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敞开心扉，接受教育可能意味着什么，超越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自负和短视。只有在这些共同的基础上，与地球上所有生命一道，才能学到我们未来在这个星球上生存所迫切需要的协作、集体和相互修复的经验。我们不能单独行动。是时候学会融入这个世界了，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已经无法摆脱地纠缠和嵌入在一起，我们将永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30 年

黄宝印

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20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优化培养类型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稳步发展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原则上只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主。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指出，到 2025 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了新时代。

1990 年 10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置专业学位调研工作的情况汇报》和《关于设置和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几点意见》。1991 年 3 月，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下发《关于进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试点工作和进一步开展研讨工作的通知》，批准清华大学等九所高校开展试点工作。2021 年，是我国专业学位制度实施 30 周年。30 年来，我国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迅速、成绩显著，类别上从 1 个发展到 47 个，层次上从硕士发展到博士，规模上从年招几十人到现在年招 60 多万人，比例上从占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到个位数到现在的百分之

六十多，培养院校从少量院校到现在基本覆盖所有研究生培养单位，作用上从作为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的有益补充到现在的同等重要，认识上从不被了解到现在的广受欢迎，模式上从以学习借鉴为主到更具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我国专业学位教育正迎来更具规模化、更具高质量、更具中国特色、更具影响力的大好机遇和有利形势。国家大力支持，出台重要举措；高校高度重视，加大改革力度；专业学位教指委加强指导，引导协调作用显著。中国专业学位教育制度日益健全、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深化、质量不断提高、实践部门需求日益广泛、社会的认可和欢迎持续增强，中国特色专业学位教育日益显示勃勃生机，前景广阔。

专业学位的诞生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及时进行转型、探索并逐渐成熟、完善，以培养适应这种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型人才。我国专业学位也正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而产生并伴随着这一伟大进程而不断蓬勃壮大起来的。1992年，国务院学位办印发关于《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协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和《工商管理硕士试行培养方案》鲜明指出，我们搞的是中国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它既不是现有研究生培养方式的简单移植，也不是外国MBA的机械模仿。应根据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探索培养中国企业家的途径。这是管理教育深化改革迈出的可喜的第一步，并且把探索中国发展专业学位的有效途径放在突出位置。专业学位教育是舶来品，但从一开始我们就清醒地认识到，通过研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深入研究我国社会需求和教育实际，不断深化对专业学位的认识，不断加强对专业学位教育规律的把握，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发展之路，这是必须也是必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可以说，中国特色专业学位制度已然建立，类型多样、各具特色、生机盎然、独具优势，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力量。

在专业学位制度实施30年之际，本文以若干“首次”或“首个”梳理30年来我国专业学位走过的重要节点，对专业学位发展历程提供若干理解和把握的视角，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首个专业学位研究小组

1988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专门讨论设立专业学位问题，指出“过去我们培养研究生的模式比较单一，主要是学术性学位（适合于搞科研和教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近几年来我们强调培养规格多样化，如工程硕士、管理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和博士等；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应用型人才的需要。这种学位其中一部分实际上具有职业学位的性质，与一般的学术性学位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论文要求和培养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其最大特点是，获得这种学位的人，主要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而是带有明显的职业目标，如医生、工程师、企业家等。我们考虑应该在试点的基础上，对我国是否需要建立职业学位问题进行研究”。1988年12月，国务院学位办印发《关于召开设置中国式MBA学位调研会的通知》指出，为探讨在我国设置中国式的类似国外MBA学位，应有关学校的要求，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调研会，讨论在我国设置MBA学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989年3月，国务院学位办印发《关于设立“培养中国式MBA研究小组”的通知》，提出关于试办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暂名）、设立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方案，包括进一步论证试办专业的必要性及其名称，中国式MBA的基本规格要求、培养目标、研究方向、主要的学位课程设置、学位论文的要求以及保证质量的措施等。1989年4月，原卫生部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文提出《关于组建“医学职业学位研究小组”的报告》，决定着研究医学职业学位和试行方案；1989年5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复函原卫生部《关于组建“医学专业学位研究小组”的报告》的批复》，请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任研究小组组长。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自成立以来，首次将有关专业学位问题研究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并做出专门部署。专业学位研究工作正式启动，首先从直接面向经济主战场和生命健康的行业领域以及在国外已有成熟做法的教育领域开始。

首个专业学位类别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专门讨论《关于设置专业学位调研工作的情况汇报》《关于设置医学专业学位的初步设想》和《关于开展建筑学专业学位论文工作的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置和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几点意见》，决定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试点工作。会议认为设置专业学位十分必要，其目的是促进我国应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加速培养应用学科的高层次人才，改变我国学位规格单一的现状。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次明确专业学位的提法，并明确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的重要性和培养指向，拉开了我国学位制度从以学术学位为单一标准向开始重视应用型人才转移的序幕。该《意见》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必须面向日益发展的国民经济建设。设置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试行培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的工作，目的就在于通过这条途径培养出一批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懂得专业，能卓有成效地组织与指挥社会化大生产，善于经营，能够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的中、高级管理人才，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事业服务。同时，这种专业学位的设置将使我国的学位制度更趋完善，将推动我国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多样化，使学位制度进一步适应科学技术事业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我国设置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试行培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是十分必要的。

首次按专业学位类别授予学位

199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了黄达等学位委员提出的“关于按专业授予专业学位证书的建议”指出，由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我国现行学位是按门类授予，所以，同为“工商管理硕士”，却要分别按经济学门类或工学门类授予，这势必会在各用人单位乃至社会上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和混乱。随着改革（包括学位制度的改革）的不断深入，专业学位的设置将会逐渐增多，建议在确定设置的专业学位中，按专业学位本身而不是学科门类授予学位。这是对《学位条例》中学位授予方式的改变，但符合专业学位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通过试行专业学位，同时允许按照专业学位类型授予学位，是我国学位制度的一次大的突破，也是历史性的突破。目前，我国学位类型有两种，即学术性学位和专业学位；授予学位的方式也是两种，即学术性学位按门类授予，专业学位按专业学位类别授予。

首次成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成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的重大特色。1995年，全国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由26所MBA试点单位推荐的专家、学者和管理干部组成，特别邀请全国企业家协会会长袁宝华同志担任主任委员。当时的主要考虑是，专业学位教育和行业部门紧密结合，必须得到主管部门、行业领域的支持与参与，应该聘请既熟悉教育，又在行业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最好是主管部门的领导同志担任主任委员。袁宝华同志曾任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时任全国企业家协会会长，是最好的主任

委员人选。袁宝华同志欣然担任，并在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以《继往开来，积极探索，创办中国特色的工商管理硕士教育》为题作了书面发言，他指出，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袁宝华同志担任主任委员期间，为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贡献。后来，每设立一个专业学位，都相应地成立了教育指导委员会，并聘请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同志担任主任委员。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规程》，进一步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由有关主管部门、行业、企业和事业单位及学位授予单位推荐的专家和负责人组成，是协助主管部门开展相应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咨询、指导评估和交流合作的专业组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是指导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组织，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迅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多年来，教指委在制定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核心课程设计和教材建设、案例库建设和师资培训、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学位论文标准和学位授予基本要求、开展合格评估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迅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

首次颁布专业学位设置办法

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对专业学位的设置目的、特点、层次、审批、培养、管理等作了制度化的规定。该《办法》指出，专业学位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目的是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专业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但一般只设置硕士一级；各级专业学位对应我国现行各级学位，处于同一层次；专业学位的名称表示为“××（职业领域）”硕士（学士、博士）专业学位。《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对于我国专业学位教育的规范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首次开展在职攻读专业学位工作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九五”期间开展企业管理人员在岗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工作的通知》，配合中央搞活、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工作，着重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好，善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队伍；以服务于企业为目的，在企业、院校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开启了我国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的新路径。在当时研究生招生规模小、社会需求又非常迫切的情况下，实现了加快满足实际部门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求的迫切需要。同时也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即在职攻读，有招收计划、统一入学考试、在职培养，有学位无学历，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培养与使用相结合的招生培养模式，得到了广大在职人员的欢迎。自此以后，其他专业学位相继采取这种方式，扩展丰富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渠道。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从2017年起，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类分别编制和下达全国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计划纳入国家硕士生统一招生计划、统一考试中，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该《通知》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开辟了国家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类分别编制和下达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历史，结束了专业学位在职攻读只有学位没有学历的历史，结束了专业学位在职攻读游离于国家统一招生计划、统一考试制度、统一培养体系外而没有相应政策

保障的历史。在职攻读专业学位 20 年这一阶段性的重要渠道，完成了阶段性的重要任务，累计招收培养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180 余万人。

首次开展专业学位水平评估

2000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开展中国高校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教学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教学设施、师资队伍、教学管理、教学组织、教学效果、办学特色等六个方面，评估结束后公布了评估排序结果，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2016 年，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启动专业学位水平评估试点工作。这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是国家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测的重大举措，是我国专业学位首次开展的大范围水平评估，具有示范性、推动性、引领性特点，2018 年 7 月发布评估结果，《人民日报》以《对专业学位教育的一次检阅》为题予以报道，指出对专业学位按类别进行水平评估，让办学者、学习者、用人者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发展位势，很有必要。2020 年，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委托，学位中心全面启动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涉及 30 个专业学位类别，聚焦立德树人、突出职业道德，聚焦培养质量、强化特色定位，聚焦行业需求，强调职业胜任，推动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构建和完善符合专业学位发展规律、具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体系。《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30 个专业学位类别将‘体检’”，《中国教育报》刊登学者文章指出“专业学位评估设计理念彰显大智慧”。

首次召开全国专业学位教育工作会议

2001 年 1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召开了首次全国专业学位教育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人事部副部长尹蔚民及原国家经贸委、建设部、卫生部、农业部等部委负责同志，有关省市、高校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在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设置专业学位，不仅完善了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符合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做到了教育要适应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经过十年的努力和建设，专业学位已成为与学术性学位并行的一种新的学位类型，专业学位教育特色逐步显现、种类逐步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制度不断完善，已经成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会议认为，专业学位与学术性学位处于同一层次，但培养规格各有侧重，不能相互替代，不能简单套用学术学位标准，要抓紧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充分发挥教指委功能和作用，在发展规模的同时要确保质量，要求各培养单位加强专业学位教育研究，制定具体举措。

首次制定专业学位教育专门文件

2002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科教兴国战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需要，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促进专业学位教育的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实践证明，专业学位教育适合我国国情和教育实际，发展专业学位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与学术

性学位人才培养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两个重要方面，在高等院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要求有关高等院校充分认识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的重要性，抓住机遇，创造条件，积极促进专业学位教育的健康发展。这个文件明确了专业学位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专业学位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国家统筹规划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研究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规律，制定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指导、协调与专业学位教育有关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专业学位教育的较快发展。

首次开展研究生专业学位总体设计研究

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提出对专业学位教育进行总体设计研究。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成立“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总体设计研究”课题组，成员由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司法部、中国人力资源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时任原人事部副部长王晓初同志担任顾问，时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院士任组长。课题组围绕“是什么 - 为什么 - 怎么样 - 如何做”的思路，重点围绕什么是专业学位、为什么要发展专业学位教育、我国专业学位的发展现状和需求怎么样、国外专业学位教育发展有哪些经验，以及未来我国专业学位教育发展总体走向及政策应当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等问题展开。课题组先后召开七次研讨会，重点研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专业学位情况，组成考察团赴美国专门考察专业学位教育，对全国已经开展资格认证的各类职业进行了大范围调查，涉及48个部门、15个省市，取得1054种职业的基础数据和人才需求数据。课题组经过2年的深入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专业学位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其层次和类型结构的和谐发展有助于其有效发挥社会职能，发展专业学位教育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发展知识经济的重大举措，我国应当积极发展专业学位教育，为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这次课题组研究，是关于专业学位教育的一次深入、系统的研究、论证，强化了对专业学位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认识，也强化了行业部门、高等院校和政府关于发展专业学位教育重要性迫切性的共识。课题成果以《开创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时代——研究生专业学位总体设计研究报告》为题出版。

首次增招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2009年，教育部党组决定增招硕士研究生，全部用于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并逐年减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这一政策调整改变了过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一般不招收应届毕业生而以在职攻读学位为主的局面，专业学位进入到了研究生招生的主渠道，确立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整个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2009年3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09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工作的通知》指出，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范围，在相对稳定招生总规模的前提下，各招生单位要逐步减少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数量，不断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国家进一步加大调整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力度，统筹考虑研究生办学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学科专业结构，合理确定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比例，大力发展符合我国产业结构特点的专业学位。这次增招，出发点是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着力点在以此为契机，加快调整和优化硕士研究生的类型结构，增强研究生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并且出台一系列专业学位教育重要政策，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大契机。2009年3月，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席会认为，当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培养模式

以学术型研究生为主，应用型精英培养重视不够，规模较小，比例偏低，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必须调整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定位，优化硕士研究生教育结构，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首次制定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2009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文件。该《意见》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培养模式、质量标准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要突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色。明确课程设置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养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教学内容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教学过程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增长实际工作经验，缩短就业适应期限，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重要的教学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要撰写学位论文，但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调研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文学艺术作品等形式，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重视构建和形成一支适应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师资队伍，建立健全合理的教学科研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校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

首次制定专业学位发展总体方案

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该《总体方案》明确发展专业学位的四个原则：适应社会需求，强化职业导向；创新培养模式，突出自身特色；优化结构布局，着力完善体系；完善保障机制，注重提高质量。明确到2015年，实现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战略性转变；硕士层次的专业学位类别增加一倍左右；稳步发展博士层次专业学位教育，本着“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精神，深入论证，有序推进。到2020年，实现我国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转变为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专业学位教育体系基本完善，研究生教育结构和布局进一步优化，培养质量明显提高，研究生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满足人民群众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提出了加快创造和完善有利于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宏观环境，积极引导、鼓励行业、企业及社会力量支持、参与专业学位教育，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选拔改革力度，改革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入学考试方式，改革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设置审批办法，改革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办法，大力推进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的衔接，建立健全硕士、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宏观管理与质量保障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培养质量等一系列重要举措。该《总体方案》既有原则、目标，更有具体政策安排、改革举措，是综合性改革的制度性文件，对专业学位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次颁布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设置与授权审核办法

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设置与授权审核办法》，明确专业学位名称表示为“××（职业领域）硕士（博士）专业学位”，拟设置的专业学位，一般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具有明确的职业指向，所对应职业领域的人才培养，已形成相对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对应职业领域已形成相对独立的专业技术标准，以及相对成熟的职业规范和特定的职业能力标准；对应职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较大规模；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有关学位授予单位提出专业学位类别的设置申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有关专家进行论证，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工作一般每五年调整一次；批准设置的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组织并协调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有关学位授予单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成立全国性的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专业学位授予单位的相关教育教学活动。硕士、博士专业学位授权审核以相应学科作为基础，但不以是否具有学术性学科授权作为专业学位授权的必要条件，申请专业学位授权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具有以实践为导向的办学模式、良好的办学条件、教学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以及长期稳定的专业实践场所，未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或在招生与学位授予中使用有关专业学位的名称。该《办法》是关于专业学位定位、内涵、设置及授权、管理等环节的制度性、规范性安排。

首次颁布专业学位目录

自我国实施学位制度以来，国家先后四次颁布实施学科专业目录，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实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这三次颁布实施的学科目录，针对的是学术性硕士、博士学位。自1991年开始招生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一直没有单独的专业学位目录。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同时颁布了《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明确新设置的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统一编入硕士、博士专业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目录，作为专业学位授权审核、学位授予、人才培养和教育统计分类等工作的依据。

首次一次性新增 19 种专业学位类别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置和试办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开启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先河，至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先后审议通过了19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2010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一次性审议通过了19种新增硕士专业学位类别，使我国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增加到38种，涉及经济、管理、社会与文化、新闻出版、工程、农林、医药卫生等领域。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上审议专业学位文件最多、新增研究生专业学位类别最多、讨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最深入的一次重要会议，对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影响。专业学位类别更加丰富，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了制度创新、总体推进、加快发展、全面提高的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表明，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招生模式、培养模式、管理模式等都将发生重大转变和调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崭新的时代。

首次单列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2010年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下达201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确定201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学术型研究生361990人，专业学位研究生110010人。明确继续适度发展研究生教育，着力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和层次类型结构，扩大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特别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这在国家招生计划中，首次将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单列下达，表明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具有了与学术型学位研究生并列的、独立的计划体系，表明了加大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的政策意图，具有较强导向性和牵引性。经过调整，2010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占整个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比例达到24.67%。同时，积极探索适合高层次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评价方式，建立完善学术型和专业学位两种类型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2010年整体上采取“分列招生计划、分类报名考试、分别确定录取标准”的招生考试模式，按照“科目对应，分值相等，内容区别”的原则设置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根据培养要求和生源特点确定考试内容，突出考查考生运用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采取何种选拔方式，一直在探索，既要体现特色，更要保证质量和要求。

首次专门部署构建专业学位就业服务体系

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服务体系有关工作的通知》指出，必须做好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工作，把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工作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切实纳入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总体工作，努力构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服务体系。要求各省级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加强分类指导，积极开拓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市场，营造有利于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就业环境。2019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史无前例。该《通知》指出，发展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是促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重申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要求各级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公开招聘要根据岗位需求合理制定招聘条件，对不同教育形式的研究生提供平等就业机会，不得设置与职位要求无关的报考资格条件；各地要合理制定人才落户条件，精简落户凭证，简化办理手续，为不同教育形式的研究生提供平等落户机会；各地要落实好就业创业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研究生都能享受。专业学位占非全日制研究生较大比例，这些政策举措有效保证和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顺利发展。

首次印发普通高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资助办法

2010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普通高校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指出，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资助工作是高校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研究生教育尤其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关系到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队伍的建设，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全面落实。要求各高校将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资助纳入全校资助工作范围，在政策措施、经费投入、条件保障等方面与普通研究生一视同仁。按照规定标准，向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国家任务研究生按月发放研究生普通奖学金；配合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及时

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其基本学习和生活费用问题。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积极配合当地财政、银监等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做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督促所属各县级资助管理机构会同具体办理贷款业务的基层金融机构，及时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办理发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专业学位类型多样，公平的、完善的资助体系对于吸引优秀生源、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至关重要。

首次开展专业学位综合改革试点

2010年4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开展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64所高校开展试点。试点工作旨在鼓励和推进培养单位积极探索和创新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特点、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要，加快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新模式。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在培养模式方面，在课程体系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内容与方式、研究课题和专业技能训练、实验室和实习实践基地建设、考核评价标准和方式等方面，要求有实质性的创新；二是在管理机制方面，在招生结构调整、与行业和企业共建合作、教学科研考核与评价机制、奖助贷体系建立、教育管理机构完善等方面，要求有突破性的改革。2015年，又选择工程、法律、会计3个教指委，上海、江苏、北京、辽宁4个省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2个部属高校，进一步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积极探索可借鉴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发挥试点单位示范作用，积累经验，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专业学位教育体系，促进人才培养水平的明显提高。

首次开展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试点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意见》，针对有关行业领域特殊需求的高层次专门人才，通过择需、择优、择急、择重，批准64所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招收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这一做法是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一次重大突破。以往的做法是，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首先申请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首先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这一次，直接申请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引导本科高等学校紧密结合区域、行业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将科研和教学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同时，批准5所民办高校开展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民办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这也是一次重大突破。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关于开展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的通知》，积极推进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改革，突出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要求，首次明确不以学术学位授权点作为增列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必要条件。同时，鼓励学位授予单位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及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在硕士学位授权点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自主调整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首次开展专业学位高质量认证

中国高质量MBA教育认证（Chinese Advanced Management Education Accreditation，简称“CAMEA”）于2012年启动，由教育部学位中心会同全国MBA教指委联合开展，清华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通过。CAMEA是国内第一个专业学位教育认证，目前已有21家培养单位通过认证，形成

了较为完整的认证框架和体系，构建了较完善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学位中心已与美国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韩国管理教育认证协会（KABEA）、英国 MBA 联合会（AMBA）等认证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具有较高社会认可度及国内外影响力。质量认证，是专业学位发展中较为普遍和成功的做法，以办学单位自身定位为目标，通过专家诊断，强化目标达成、过程改进、持续提高、形成特色与优势。随着我国专业学位高质量发展，加快质量认证工作、提升质量认证品牌，对于系统总结专业学位办学经验、提炼办学特色，提升影响力，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树立中国专业学位教育良好形象、发挥质量认证在区域和国际领域的带动与引领作用都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价值精神、符合国际惯例的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体系已具备良好条件和基础。

首次编写专业学位类别基本要求

2015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根据专业学位特点专门制定，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应该达到的基本标准，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也为教育行政部门开展质量监督、学位授予单位保证学位授予质量、导师指导研究生学习提供参考依据。

首次印发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专门文件

2015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充分认识到加强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的重要意义，案例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为基础，通过呈现案例情境，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掌握理论、形成观点、提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加强案例教学，是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推进教学改革，促进教学与实践有机融合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手段。基地是培养单位为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与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建立的人才培养平台，是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的主要场所，是产学研结合的重要载体。加强基地建设，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是推动教育理念转变、深化培养模式改革、提高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该《意见》进一步推动各培养单位重视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创造条件，加大经费和政策支持力度，设立专项经费，为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提供条件保障，通过人才培养项目、实验室建设、联合科研攻关等途径加大对案例教学和基地建设的投入，强化其在专业学位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首次实现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授予数大体相当

自 2010 年以来，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步伐加快，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点、招生规模大幅、快速增加，大大提高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能力。2015 年，我国授予硕士专业学位 31.27 万人，占全部硕士学位授予数的 49.3%，实现了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并重的局面。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录取 106.2 万人，其中硕士专业学位录取人数 65.7 万人，占比 61.9%。目前，在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专业学位已成为主体。有些高校明确宣布，有些学科不再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这一形势，一方面说明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结构更加优化、更加成熟，是学位制度和人才培养类型结构的与时俱进和战略调整，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社会发展、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进步，

是社会实践部门知识素养和人才综合能力需求的系统性转型和整体性升级，也是强国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基础与有力保障。

首次成立全国专业学位案例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

2013年，在教育部和财政部的支持下，在教育部学位中心成立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每年拨付专款支持高水平案例建设。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适应和服务新时代专业学位发展需求，提升案例支撑实践创新人才培养能力，2020年，学位中心成立中国专业学位案例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旨在引领、指导、推动中国专业学位案例建设，指导制定案例中心发展战略、目标规划、建设路径及运行机制，推动中国案例建设高质量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由行政主管部门领导、相关专业学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具备丰富经验和较高声誉的知名专家组成，特别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担任主任委员。教育部郑富芝副部长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案例是重要的教学、教材资源，加强案例建设是进一步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支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进一步丰富教育教学资源、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迫切需要，需要从国家层面统筹推进，着力打造中国专业学位案例建设新模式。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在案例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指导下，正在积极建设“精品案例库”，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专业学位案例建设的新模式、新品牌、新高地。

首次发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

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指出，截至2019年，累计授予硕士专业学位321.8万人、博士专业学位4.8万人，针对行业产业需求设置了47个专业学位类别，共有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5996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78个，基本覆盖了我国主要行业产业，探索形成了国家主导、行业指导、社会参与、高校主体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格局，积累了中国特色专业学位发展经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是主动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路径，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必须大力发展、加快发展。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进一步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产教融合培养机制更加健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衔接更加紧密，发展机制和环境更加优化，教育质量水平显著提升，建成灵活规范、产教融合、优质高效、符合规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着力优化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结构，完善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和授予标准、健全更加灵活的硕士专业学位类别管理机制、推动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稳健增长、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大力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可以预见，博士层次专业学位类别、博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和授权点、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将会有大幅增加，将极大丰富和拓展博士层次高端人才的供给结构和能力，进一步满足和增强适应社会实践部门对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国特色专业学位制度。同时，也将对高校博士专业学位专门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和挑战。

引自《中国研究生》2021年10月刊

学位中心召开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指标权重专题研讨会

根据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整体安排，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组织召开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指标权重专题研讨会，邀请全国相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人等 40 余位专家出席会议。

学位中心主任黄宝印指出，今年是我国专业学位实施 30 周年，首次开展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时机正好、意义深远。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自 1991 年开展以来，走过了三十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20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数已占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数的 60.8%。在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努力做好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责任重大。要紧紧围绕教学质量、学习质量、职业发展质量，聚焦立德树人、突出职业道德，聚焦培养质量、强化特色定位，聚焦行业需求、强调职业胜任，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增添新动能。他强调，指标权重设计是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中的重要环节，要坚持协商性、一致性、导向性、科学性的“四性”原则，充分依托教指委、依托专家，充分协商，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充分体现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理念和指标体系基本原则，保持高度一致；充分体现专业学位有关政策要求和专业学位发展趋势，发挥正确引导作用；要充分体现科学性，指标权重设置要注重整体性、严谨性和合理区分度，既体现差异更注重协调统一。黄宝印对教指委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感谢，自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启动以来，从评估核心理念形成和指标体系构建到评估组织开展、权重设置和专家评价，都始终充分依托教指委大力支持，依靠专家集体智慧，这是专业化高质量评估、形成科学真实可靠评估结果的有力保障。

评估顾问林梦泉介绍了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工作主要进展。评估启动后，历时 5 个月，通过数据标准、重复、属性、公示等八大举措，对 35 万条信息进行了全面核查“清洗”，并反馈单位进一步核实；组织专家进行学理性研究、专业化设计，完成了问卷调查，回收率超过 40%；研究建立负责任专家评议增强机制，不断提高专家评议质量。下一步将继续做好信息复查、权重设置、专家评议、结果数据处理等重点工作。

学位中心副处长韩菲具体介绍了指标权重设计思路和“四步四值”工作程序与方法。指标权重设置遵循“四性”原则，按照“四步四值”程序开展，即：第一步，结合指标体系设计考虑及前期调研意见，研究论证形成指标权重“初始值”；第二步，召开指标权重专题研讨会，邀请有关专家研讨并最大程度达成共识，确定指标权重“参考值”；第三步，按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在一定范围内开展权重调查，征求参评单位意见，形成指标权重“建议值”；第四步，统计分析，形成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指标权重“最终值”。

与会专家围绕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指标权重和相关工作展开充分研讨。专家对评估前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本次评估指标体系突出体现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指标和观测点充分体现了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特色，评估工作整体安排严、慎、细、实，评估各项组织工作井然有序。专家们认为，此次评估指标权重设置提出的协商性、一致性、导向性、科学性的“四性”原则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四步四值”的工作程序和方法科学严谨，能够保证指标权重“最终值”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公信力。

经过深入研讨，专家总体认同指标权重“初始值”结构，对教学质量、学习质量、职业发展质量三个一级指标的相对权重关系达成共识，对培养方案与特色、社会服务贡献、学生满意度、案例教学使用成效及开发建设等指标和观测点权重进行重点研讨，达成一致共识。会后，针对本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特点，与会专家提出了指标权重调整意见，并填写了“指标权重征求意见表”。

下一步，学位中心将在深入研究专家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设置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指标权重，形成指标权重“参考值”，并根据评估整体工作安排和权重设置工作程序，进一步高质量做好相关工作。

【学科建设】

我国研究生培养政策范式变迁与思考——基于 1949—2020 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魏淑艳, 张博文, 武育芝 东北大学

摘要: 研究生是国家创新型事业发展的后备力量, 探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研究生培养政策范式变迁历程、演进逻辑与发展理路, 对优化我国研究生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政策范式变迁理论为研究框架, 将 1949—2020 年间中央层面颁布的研究生培养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内容分析法, 探究我国研究生培养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研究发现: 我国研究生培养政策范式变迁经历了探索起步、创新发展、提质增速以及内涵式发展四个阶段, 各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具有差异性。政策范式在体制改革和执政理念转变的驱动作用下发生变迁, 形成了政策问题由“结构”到“要素”、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计划”到“宏观引导”的演变逻辑。

关键词: 研究生培养; 政策变迁; 政策问题; 政策目标; 政策工具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中国政府治理模式改革研究”(15AGL017)

引自《现代教育管理》·2021 年第 11 期 p79-88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的 理论解构与机制重构

胡洪彬 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 推进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有内在的学理依据, 也是破解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短板的现实需求。推进 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的科学展开, 必须明确问责的主体、客体、情形和程序, 以从理论层面上对“谁来问”“去问谁”“问什么”及“怎么问”等命题作出系统性的解答。近年来, 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积极推动下,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在实践运行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协同性、常态性和规范性。当前有必要通过形成内在的多元协同机制、全程覆盖机制、规范运行机制、信息透明机制和文化引领机制, 对研究生教育质量问责作出整体性的机制重构, 为新时代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供更加坚实的机制保障和理念支撑。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 教育质量问责; 问责机制; 新时代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年度项目“程序正义原则下新时代教师问责机制的重构”(编号: 2018SCG190)

引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 年 10 月 p1-9

影响博士学位授予质量的导师因素分析和对策

博士学位质量中最关键的是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 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也是从国务院学位办、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和各高校研究生管理部门所聚焦的重点。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就是一个重要的监督机制, 各省级学位与研究生管理部门和各校组织的博士论文盲审是提高博士学位质量的重要途径。一个高校的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一定程度代表了该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 我国建立了多层次比较完善的教育评估体系。博士生导师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2013 年 3 月 29 日,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 着重要完善导师管理评价机制, 全面落实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提高师德水平, 加强师风建设, 发挥导师对研究生思想品德、科学伦理的示范和教育作用。

二、导师队伍现状和导师指导特征

国内各高校导师队伍建设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建设，随着各高校人才引进工作国际化推进，导师队伍结构正逐步优化，导师的科研和指导能力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导师队伍和导师指导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高校陆续建立导师培训制度，提高导师责任意识，全面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2013年3月29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各高校陆续建立导师培训制度，苏州大学于2010年成立国内首个导师学院，旨在推动导师队伍由规模发展向素质优化、能力提升的跨越，着力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苏州大学导师成立十年来，已有各级各类导师近3000人在苏州大学导师学院参加培训。苏州大学于2018年建立德政导师制度，将德政教育贯穿整个研究生培养过程，全面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二）导师—研究生比例提高

从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一批学位授权点审批以来，国内各高校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大幅增加。虽然各高校在学位授权点上增列和认定了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导师，但是研究生招生指标数量增长有限，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增长速度缓慢，导致导师—研究生比例明显提高。由于研究生指标紧缺，很多高校出现了多个导师依靠科研成果、科研项目和经费竞争上岗的局面，只有足够优秀的导师并拥有良好的科研团队和科研经费，才能获得研究生的招生资格，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导师的优胜劣汰，同时也促进了研究生指标的优化配置。从实践立场和人学立场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中青年导师成为主体力量

研究生导师的育人角色和职业规范对研究生培养成功越发起重要作用。近年来，高校导师遴选标准逐渐提高，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导师队伍的能力，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了良好的师资基础。在逐渐提高的导师遴选标准下，获得导师资格的年轻教师比例提高，导师队伍年龄结构更趋优化，中青年教师成为导师队伍的主体力量。以苏州大学为例，35~45岁年龄段导师占比例为72%，成为该校研究生指导的主体力量，实现了导师队伍的年轻化。

（四）导师团队培养研究生成为一种趋势

科研团队有巨大的聚合效应，推行“学术大师+创新团队”研究生培养模式已成为高校的共识。优秀导师领衔组建研究生指导团队和研究生培养平台，以科研项目为导向，科研经费为保证，促进优化循环发展，发挥导师指导研究生的积极性。各高校对研究生培养质量高的导师团队重点增加投入，促进研究生优化培养，促进多学科交叉，成为各高校的优质发展道路。打造学术成果丰硕、指导团队结构合理、学术科研思想活跃的优秀导师团队，全面提高学位授予质量。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规模有了较大扩张，结构也渐趋合理，导师队伍总体呈现快速协调发展势头，中青年导师成为研究生培养的主力。这些基本态势较好地适应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也为进一步深化和改革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目前博士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问题

1. 导师在博士研究生招生中没有足够的招生自主权，博士研究生源质量不高。部分高校依然招收在职和年龄偏大的博士研究生，这些攻读博士学位人员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原因，在校时间和实际

投入科学研究时间不足，在整个博士研究生培养环节，无论是课程学习，还是在实验室进行科研的时间都受到极大地限制，最终导致科研成果不突出，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不高。

2. 部分博士研究生学科基础知识不牢，无法进行深层次的科学研究。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博士研究生是跨专业考博，其学科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基础课程尚未修全，而在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忽视本学科基础课程的教学和考察，对不具备研究基础的博士生未能及时进行分流淘汰。对于学科基础薄弱和跨专业读博的学生，没有对该学科专业基础课程进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导致在博士研究生培养后期，无法对本学科深层次课题进行研究和创新

3. 与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类似，在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学位质量监控环节存在滞后的现象。部分导师把博士学位质量控制和管理置于博士学位论文撰写阶段甚至是博士论文送审和答辩阶段，对于专业基础不夯实，尤其是跨专业考博的研究生来说，博士学位质量失控风险过大。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和博士生对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环节重视不够，对选题的背景、国内外最新进展、研究思路和可行性没有深入研究和分析就匆忙进入开题程序。大多数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环节评审方式为会评，并且评审专家多数由导师本人邀请。在博士生尚未对该课题有充分了解，可行性报告不完备的情况下，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环节，增加了博士学位授予质量的风险。

4. 导师和博士生对于学位授予质量的理解有偏差。部分导师和博士生认为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等同于发表学术期刊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过分强调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级别，忽视了博士学位论文本身的质量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规范。部分导师培养博士研究生过分依靠本人经验，培养过程缺乏规范化，未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四、提高博士学位授予质量对策

1. 强化导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职责意识，加强导师对博士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师对博士生的德政教育帮助博士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培养博士生成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层次人才。博士研究生经过本科、硕士阶段，虽然已经相对成熟，但由于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家庭环境、性格、专业背景。导师需要强化自己德政导师的身份意识，除了在学业上，在生活上也应该关心关爱博士生，做好博士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激发博士生的科研创造力。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帮助博士生树立正确的科学道德意识和科学伦理观。

2. 增加博士生导师招生自主权，继续深入推进博士生招生改革。改变原来的入学考试方式，实行“申请—考核”制和“入学复核制”相结合的招生制度。在“申请—考核”制基础上增加入学复核环节，由复核专家小组对拟录取博士生进行学科基础面试。复核小组深入考核博士生已取得拟录取专业的学术成果、攻读博士的研究计划和计划投入科学研究的时间。由本校导师从硕士生中选拔有潜力的硕士研究生进行硕博连读，有利于增强科学研究连续性，从而提高博士学位授予质量。导师加强对新入学博士生学科基础课程的考察，对跨专业的入学的博士生要补充学习本科和硕士阶段的核心课程并进行考核，对博士生实行主干课程考察分流机制，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生进入分流淘汰序列。

3. 导师将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控制和监督阶段前移。从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开始，各环节都进行质量控制和监督机制，组织专门人员和经验丰富的研究生督导对质量进行监控。在博士论文开题环节之前，实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盲审机制。导师和博士生对课题经过充分研究和可行性探索后提交开

题报告，由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实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盲审机制，未通过盲审的博士生不得进行论文选题。在论文答辩环节之前，需要对博士论文盲审结果和意见进行汇总分析，逐个进行修改和反馈，经过博士论文答辩小组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4. 对博士研究生导师进行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加强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规范化，避免导师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过渡经验化、自由化。在导师培训中，邀请培养博士生经验丰富的优秀导师介绍培养经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对国家、省、校研究生培养规章制度进行解读，在培训后开展应知应会测试，使新上岗博士生导师了解并熟悉国家和学校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避免在培养过程中发生程序错误的现象。

5. 实现博士研究生培养岗位制，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与退休等制度不相关联，树立博士生导师的岗位意识，引入竞争上岗机制，促进年轻、优秀的教师进入博士生指导岗位。开展在岗博士生导师考核工作，加强对导师培养研究生的绩效评价，重点评价导师在师德师风、落实立德树人职责、学术水平、对研究生资助力度以及高水平科学研究项目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学生评价以已毕业研究生为主，以获得真实可靠的导师考核结果。

引自 和天旭 潘霖 教育教学论坛 2021 年第 42 期 p45-48

【队伍建设】

清华人谈：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全面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

清华校长邱勇指出，在总结经验和成绩的同时，也要认真查找分析研究生教育发展方面存在的真问题，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他结合研讨月中师生提出的意见建议，以及相关的数据和案例，从课程建设重视不够、导师责任没有充分压实、研究生培养质量有待提升、研究生发展支持体系需要完善、研究生教育体系建设和管理机制存在薄弱环节等五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面临的 21 条主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邱勇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思考和认识。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对于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意义；深化对研究生教育规律的认识；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突出系统性、协同性和整体性；加强学科建设，倡导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发挥导师引路人、同路人作用；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和教材体系建设；坚决破除“五唯”，营造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完善研究生教育体系建设，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树立国际视野，提高全球胜任力；关心学生、尊重学者，完善教学科研服务支撑体系。

在研究生教育改革工作交流环节中，研究生指导教师代表、土水学院聂建国院士结合自己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思考 and 实践，建议研究生培养坚持自主原始创新，引领学科发展，紧密结合行业需求，解决行业难题，发挥清华综合优势，推进理念机制创新。能动系党委书记李宇红以“春风化雨寓教于行”为题，从党建、实践、社工三个角度介绍了能动系以思政工作助力研究生培养的实践。物理系党委书记肖志刚介绍了从顶层设计、招生、培养、评价、导师层面秉承物理系学术传统，以学术水平作为第一要素构建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的探索。自动化系系主任张涛在发言中介绍了自动化系由内发力、向外扩张的改革经验，包括持续着力于课程质量的内涵式提升、创新课组建设、健全课程建设外部组织机构等举措。城管学院副院长王亚华建议在办学过程中积极面向国家需求，不

断创新专业研究生培养体系,重视招生和培养两个关键环节的质量控制,推进专业教育全方位改革,大力开展思政党建、案例教学、实践教学和在线教学。

引自清华大学举行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大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大学者,大师“育才”之谓也——从“双一流”建设与人才培养谈起

余寿文(清华大学原副校长)

有人通常依据各种指标体系来评价哪些大学哪些学科建设得好,多数是看论文及其被引用、被高引的数量。但此类排名只是一种信息传递,不可倚重它来评价大学和学科。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

所以,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涌现一流的老师,是建设“双一流”的核心任务。它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全面发展的素质,有国际视野和创造能力,要求我们将学生的成长成才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双一流”建设的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才培养方面的遴选条件。具体开展起来,就是要重视评价与比较下列各项:(1)坚持立德树人,在培养环节中全程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有课程与培养环节都要做到全面育人;(2)有无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协同育人,在教育创新方面成果是否显著;(3)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上是否有丰硕成果;(4)学校与学科的资源配置的政策导向是否体现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5)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体系是否完善,学校与学科的学生培养质量如何;(6)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法制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如何,人才培养的社会认可度如何。

以上列举的6个方面,可定性或半定量地评价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绩。问题是,有人认为人才培养质量难以定量评价,以至于对此几乎不予评价,或是只突出科研评价的权重,弱化人才培养应占的权重。

在学校层面,则可以评判一些子项,例如:学校在推动科研与教学融合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成果;本科生与研究生对科研育人、科研伦理和学风教育方面的反馈;学校与学科将科研成果转化到教材与培训环节的实绩;学校在教师职称评定政策中,教学与教育改革部分与科研成果和论文发表中的认可比例是否适当。凡此等等,还可以列出多条。

除了上述的政策层面和实施层面,我们应当加强与人才培养相关的理论与认识的研究讨论与交流,诸如:(1)制定实施并不断改进关于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标准,实行定性半定量相结合的遴选评定与成果检查与验收方法,真正重视人才培养在“双一流”建设中的核心地位;(2)在大学-学科-专业的评估与认证中真正重视学生,注意学生的学习与研究产出,注意培养质量持续改进,融合推进提高一流的本科生质量与一流的研究生质量,逐级加力,实现学科与专业质量并翼齐飞;(3)在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中,鼓励研究性学习,在研究中培养人才,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引导师生“研究高深的学问”(蔡元培语)。使大学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有学习有问难,在切磋研究中,师生成长,以达成一流建设的目标。

曾有教育研究者索引我国的“专业”与“学科”两个词的原意及其演变。在当今语境中，本科以专业（类）分，研究生教育以学科（门类、一级、二级学科）分。它与国际上大学和学科的分类原意多少有点儿不一致，也影响到人们对“双一流”建设的学科评价分类与本质内涵的理解。

讲人才培养和“双一流”建设，自然牵涉到什么是大学的概念和内涵。通俗地讲，大学是培养大学生（含研究生）的地方。人们常引用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时演说中的一段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面的两句话却少有人引用，即“我们的知识固有赖于教授们的指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其实全文原意可概括为：“大学乃大师‘育才’之谓也。”解放后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倡导办大学要抓“方向、质量”，培养学生要“全面发展、又红又专”，更接近现今“双一流”建设的内涵。教育家们对办好大学培养好学生都有蕴意深刻的名言，值得“双一流”建设中借鉴。‘

引自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09-22

导师直接关系研究生培养质量：应兼顾好学业指导与做人引导

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意义重大。应该说，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决于方方面面的协同努力，但导师无疑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导师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导师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应该履行好角色的双重内涵，兼顾好学业指导与做人引导，做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和未来的国之栋梁。

导师群体作为高校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力量，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任。要取得好的培养效果，使学生健康成长，导师的角色履行至关重要。导师主要职责在于“导”，其具体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要在学业上给予高水平的指导，使研究生能够在学习中开阔视野，迅速了解专业和学科发展的前沿；另一方面，要兼顾立德树人的使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使学生拥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从而成为身心健康、德才兼备、有理想、有追求的高素质人才。

《礼记》有云：“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应该说，研究生的学业重要，人生观培养更重要，因此，在研究生培养中要做到专业与思政相结合。导师不仅要去做学生学业的领路人，而且要做学生成长的知心人，一名尽职尽责的好导师不仅会使学生在学习阶段受益匪浅，而且在未来若干年可能都会对学生的人生与事业产生长远影响。

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但丁也说：“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永远不能填补道德的缺陷。”这些名言都精准地阐释了一个人才与德之间的关系，在人的成才方面，德育为先，没有过硬的道德品质作为基础和底蕴，人的才能也难以正向发挥作用，正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所以，立德树人永远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我国研究生教育70余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1949年最初的研究生在学人数620余人，到2020年在学人数预计突破300万人，培养目标也从最初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到目前的培养德才兼备并以德为先的高层次人才。面对新时代的新使命、新课题，要完成好研究生培养的当代任务，必须建设过硬的导师队伍。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进步是导师工作的重中之重。据相关调查显示，学生反映在自身成长成才过程中，导师因素的影响最大。因此，导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拿出足够的时间精力投入教书育人事业中。对于新时代所赋予研究生教育的新要求，绝大多数导师都认真勤勉地对待，兢兢业业地履责，践行立德树人的初心和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当然，导师在工作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需要在评估考核中健全配套的改革措施，以便导师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人才培养上。近年来，相关部门发文要求在职称评定和科研评价方面“破五唯”，这些政策有利于高校教师减轻负担、全心投入人才培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的成长成才，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关心，更需要学校和老师投入精力和心血。研究生导师只有履行好教书育人的双重角色内涵，才能培养出有大视野、大格局，能够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优秀学生，只有做到“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要求，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好导师。

引自光明日报 2020年9月22日消息

【授业之道】

数学家丘成桐：如何培养研究生的研究精神

做好的学问需要稳定的环境。中国在“文革”前那些年稳定的，尽管经济条件差一些。那个时候也不开放，也没有太多其他的机会。没有其他的机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人沉下心来，拼着老命做好学问。我在香港长大，在那里念中学。那个时候香港只有两个大学：一个香港大学，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我家里没有钱不能出国，香港大学是英文大学，我学的是中文，它不要我。我只有一个大学可以选择，那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所以就拼着老命走了下去。当年，陈景润那一代数学家也是这样的，沉下心来拼命做学问，做着做着就成功了。“文革”十年把以前建立起来的比较稳定的基础打破了。到了“文革”以后，那批本来学问做得很好的人年纪大了，而且经过十年“文革”胆子变小，做学问时也怕做错，怕出问题，不敢闯。

科学总是要依靠年轻人来继承发展的。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太穷了，年轻一代的优秀人才开始把目光投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希望能够在海外走出一条路来。这批人出国后成长了，开始做得很好了。国外的生活条件、学术环境比中国好很多，这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当时愿意回国的人我是很佩服的。这几十年来，中国已经习惯那些好学生出国，就连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自己也经常说送了多少学生去哈佛、斯坦福，以此作为学校的一种荣誉。

到了今天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生活水平什么的已经追了上去。我希望这段时间能够真的培养一批年轻人起来。现在年轻人士气不错，愿意做一番事业。我常去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内地的学生比台湾香港要好，要用功。很奇怪，年轻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想着赚钱，学习不太用功，现在越来越用功了。

我说大陆内地的学生好，主要是指本科生。中国本科生培养是比较接近全世界第一流的，研究生培养与世界第一流还相差很大距离。

我们应当鼓励第一流的本科生留在中国做研究生。这一点很重要。美国著名大学除了聘请一流的教授，另外的一个关键之处就是拥有世界第一流的研究生。

中国大学对研究生的态度存在误区。一般都以为研究生是跟着导师学习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就是导师的研究团队。美国的教授都是与他的研究生、博士后一同打天下的。很多研究生的想法其实比教授还好，他们更容易探索出不同的方向。博士生的研究则更重要，他们的论文往往能够改变整个学科的方向。

中国的政府和大学应该了解，导师带研究生，不是培养，而是互相帮忙，一起开展研究。现在中国给研究生的支持经费太少。据我了解，清华大学一个月给研究生 1000 多元人民币，有些研究生为了生计需要出去打工，这就太不合理了。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哈佛大学一年给一个研究生的生活费是 25000 美金，学费是全免的。很多人到了研究生就已经结婚娶妻，有这些钱才能让他生活得不错，才能没有柴米油盐的后顾之忧。这样，研究生就可以跟着导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拼几年就能够做出第一流的学问。

我们要对研究生充分尊重，并不是让他跟着导师学习那么简单。这样才能将他们的研究精神培养起来。同时，还需要建立一个公平的评价机制，给他们足够的成长空间，引导年轻人做好学问，做好了给予奖励，而不能反过来为了奖而去做学问，为了将来拿院士去做某种学问。（完）

中科院院士 杨卫：培养研究生，导师应先学生之忧而忧

研究生教育水平是衡量一所大学、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没有强大的研究生教育，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导师无疑承担着重要责任。青年导师在自己科研事业起步的同时，面对研究生培养，有诸多困惑。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开设了“相辉导师学校”，通过提升导师指导能力、规范导师指导行为来提升导师质量。近日，中科院院士杨卫，就青年导师可能会面临的困惑给出了自己的经验。

对每一位大学老师来说，最值得自豪的事情莫过于桃李满天下，这是对一位学者的最高褒奖。给本科生上大课，固然会面对很多学生，但真正和学生有深入接触，还是在指导研究生阶段。

我从 1985 年开始独立招收研究生，至今 36 年，我的学生中已获得学位的研究生有 43 人，目前在学界的 30 位，在企业的 13 位。我的最大体会是，对青年导师来说，你所指导的第一批学生往往是自己投入最大的学生，导师与这些学生的关系最密切，同时他们也将决定你的未来。对于导师来说，永远都要先学生之忧而忧，后学生之乐而乐。

招学生、出成果，导师永远面对数量和质量的取舍

数量和质量，永远是导师会面对的困惑，不论是招收学生时，还是在追求科研成果的过程中都是如此。

就我的经验而言，导师招收研究生的数量应尽量少而精，这样可以对每个学生悉心指导。团队规模应根据导师研究课题的性质来决定，如果研究课题必须通过组建团队方式才能有效解决，那就考虑组成团队式的构型。如果研究课题的重点是提炼问题，或者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有独创性的贡献，那么导师就应该少招一点学生，依次指导。

数量和质量，哪个重要，并无一定之规。我在布朗大学工学院读书时的导师，他指导的学生很少。至今，他带的学生总数还没有我带的学生多。包括我在内，他指导的学生只有 20 个左右。所以我们这些学生辈常开玩笑说“我们师门这一脉是质量重于数量”。

科研产出同样如此。当时布朗大学化学系有两名同时进入准聘期的教师，六年后，只能留一位进入长聘教职。在这六年中，一位教师发表了 4 篇论文，另外一位发表了 20 篇论文，期刊的档次都相当。最终布朗大学化学系留下了那位发表了 20 多篇论文的教师，他确实发展得不错。

那位只发表 4 篇论文的教师没有获得布朗的长聘教席，却被招到耶鲁大学。因为耶鲁大学的化学系主任是他的评委之一，他发现这四篇论文的研究已具大师气象，而且自成一派。这位教师就是昂萨格，他到耶鲁大学后没多久就获得 1968 年诺贝尔奖。这件事成为布朗大学化学系的最大遗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数量不重要，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说，一个领域的成果数量多了以后，工作才有集群效应，引用也会多，尤其是热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引用数量会非常高，这同样也是一名优秀学者的标志。所以不能盲目的批判数量，也不能盲目的相信数量，而应取决于对研究的推进效果。

青年导师，该“深挖坑”还是“广织网”？

对青年教师来说，还会遭遇的困惑是团队采用什么样的结构。这取决于导师是希望自己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独立作战的能力，还是希望成员组成“雁阵”，共同推进科研。两者的利弊同样明显。因为在“雁阵”中，肯定会有一两名学生特别突出，其他学生则未必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位学生的发展都是导师必须予以考虑的。

换言之，作为青年导师，你可以担任“深挖坑”的角色，带领团队在某一个方向，共同把研究的“坑”越挖越大，越挖越深。也可以担任发散型“广织网”的角色，这类导师培养的学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方向，学生慢慢从导师的方向转向培育的新方向，然后把新方向越做越大。

青年导师同样会面临的困惑是究竟跟着一位资深的导师往前走，还是单干？其实，正如跑马拉松时，最开始往往是有经验的人带着没有经验的人跑，然后进入了互助、交替跑的阶段，再往后，年轻人会找到新的方向自己单独跑。这就意味着，学术界并非把年轻人教好了，资深的导师就没饭吃，而是说，年轻人在发展的起始阶段要借力。

不仅年轻导师和资深导师之间如此，导师培养学生同样如此。在你的潜意识中，是希望学生比你强，还是跟你差不多，还是不如你？不同的传道之心会决定你的学生培养质量。

我的导师曾经对我说过，“我们学无先后，你要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是一日为师，终生为友”。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影响。

身为教师，我们把学生培养好，桃李天下，是一世功德，也是传承。导师要期待并且接受学生比自己强。说实话，我自己的学生中有几位，现在学问就比我强。

我从 1978 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我所在的专业是固体力学，我们专业的祖师爷是张维先生，他的学生是黄克智先生，也是我的硕士导师。余寿文老师是我的硕士生副导师，后来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与我同龄的郑泉水老师、方岱宁老师等后来都当选为院士。当时我们学科曾获全国教学特等奖——有关高质量博士生的规模培养奖项。这个二级学科培养了 13 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可说是全国最高纪录。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我们的学生现在在全世界相关领域的学校担任教职。希望若干年后，类似的一批顶尖学科可以具有培养世界水平师资的能力。这也是一流学科的最核心指标。

学术的创新和传承同等重要。2000 年左右，是我培养学生最多的时期。当时我的小分队中有 10 位学生，其中有如今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朱廷，在宾州大学担任教授的张宿林，在埃默里大学担任医学教授的吴筱益，也有美国马里兰大学担任教授的李腾。李腾现在也是科学传播界的流量明星，微信公众号粉丝众多。还有两位学生转行后，现在都是亿万富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又有了创新，所以导师和学生一起，最好的状态是共同传承，同时又不断创新。

美好理想和骨感现实之下，青年教师如何抉择

年轻导师在科研起步阶段往往比较艰难，总会觉得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很骨感。我的建议是，科研起步阶段最好是从小切口导向大问题，然后慢慢前往科研的核心路段。很多时候，青年导师所谓的条件之惑，并非自己能力不够，而是思路不够开阔。其次，导师必须认识到，进入研究生阶段，导师培养学生更多的是提供条件和服务以及适当的指导，而不是让学生跟着你的指令发展。

比如，给学生选题时，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课题，导师要花费时间精力与学生讨论。当学生有兴趣、有能力，他们很快会进入和科研契合的状态；而当有些学生的设想太宏大，但又实现不了时，就需要导师和学生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或者给学生更多支持。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是我在浙大带的第三个学生，非常聪明。他执著地想从事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目标是探究一门时空量子动力学理论。他不分白天黑夜全身心地投入这个课题。我放手让他做了三年，但没能出结果。此时，我找他谈话，建议他先把博士毕业要求的常规条件都完成，然后再做时空量子研究。学生花了一年多时间达到了博士毕业的要求。为了继续时空量子的兴趣，他选择做博士后，现在已经是第三轮博士后，他在这三轮博士后的工作中，都完成了必须要完成的课题。不久前，这名学生告诉我，时空量子的研究已经完成了 40%，但还需要 5 到 10 年才能结题。对这样的学生，应该尽力地满足其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意愿。

而我在浙大带的第一个学生，则是想法特别多，在读研究生时就参加了挑战杯之类的比赛。成为新教师后不久，他开始从事有关软体机器鱼的研究。课题结束后，他提出希望到马里亚纳海沟去进行极端条件下的软体机器鱼测试。我给他联系了实验室，联系有关科研机构给他 150 万元经费支持。今年 3 月 4 日，他的论文在《自然》杂志发表，并且是封面导读，这可能也是浙江大学第一次在《自然》正刊上发表封面论文。所以当学生有很多新想法的时候，导师只需要提供服务。

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一位导师都应该有一种意识，那就是培养好学生，不论是手把手教，还是放手让学生自己做，导师都应履行好自己的责任。但同时，导师还要做的是，帮助学生树立好目标，确保学生奔着自己的目标始终努力。

为学生把好每一道培养质量关

对导师来说，有学生之后，要先学生之忧而忧，后学生之乐而乐。为人师者，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要培养出好学生，而学生创造的知识、荣誉也都与团队息息相关。于是就要为学生把好每一道培养关。

比如，对学生的工作是否信任？学生的实验数据是否可靠？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窍门。学生的论文，导师必须精心修改每一处。比如英语论文，若学生写出的论文初稿，有的地方英语表达疙疙

疙瘩，有的地方却特别流利，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当心流利之处——很有可能是摘抄了别人的文字。同时，导师必须和每一位学生充分交流，这样才会非常清楚学生的科研情况，也就比较容易察觉学生提供数据中的瑕疵。

如何组织学生开组会？导师组织学生开组会，最糟糕的是“一言堂”，导师布置任务，讲演一通，布置完任务就散会。其次是“两言堂”，就是学生轮流讲，然后老师轮流评论。这样的组会既不利于课题组互相交流，激发灵感，发动头脑风暴，也不利于导师发现优秀学生。开组会时，往往也是导师发现学生的时候。在讨论最激烈的时候，哪些学生总是有话语权，他们则往往是最厉害的学生。有的学生在刚开始讨论时，问题不太熟悉，但是讨论一阵后，他的话语权越来越大，那他应该比较好的学生。而组会的深度往往取决于学生做完报告后开展的持续性讨论，对某一个话题持续讨论的时长和深度，也代表组会成功的程度。

最后，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协作。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他当研究生时，70%的东西是跟同学互学的。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有时候就是一种波浪式的前进，或者是前面的成员与后面的成员的接力。同学之间虽然也有竞争压力，但也是一种进步的动力。作为导师，就是要及时了解学生是否正处在某个关口，并及时给他帮助。

引自 文汇报 2021年4月27日

清华大学史琳教授：教学比天大

“工程热力学”课程是能源与动力学科的同学在大二上学期接触到的专业必修课，这门课史琳一教就是25年。2021年，为了表彰史琳在教书育人方面的突出贡献，清华大学授予她“新百年教学成就奖”。

一、让古老的理论熠熠生辉

“学生能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这是史琳始终在思考的问题。

25年间，史琳先后对课程进行三次大的改革，是最早增加大作业环节的清华教师之一，并针对大作业的不同阶段安排专题辅导，从选题、写作、标注、PPT制作等方面帮助学生掌握解决问题和流畅表达的能力。

这门课有两大难点：一是某些基本概念难以理解，二是学生往往不清楚该如何从实际的工程问题条件中提炼核心有用的信息、抓住主要矛盾。

对于复杂的概念，史琳把知识点掰开揉碎，反复强化。其中最难的第四章围绕熵、焓等物理概念展开，将课程从理论引渡到应用层面，按照“实质—铺展—解决问题的方法—能量的品质—掌握计算和分析方法—认识深入”的思路进行讲授。

“这门课程是我工科思维的启蒙。大一学习基础数理课时，往往是找到正确的逻辑链后就能沿着这条路顺畅地走通。但工科需要处理更现实的研究对象，不仅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还需要在遇到‘岔路口’时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经验去判断和抉择。”能动系2021级直博生解海鹏同学说。

对于知识应用，史琳采取“教研结合”的思路。提到温度时，她会介绍2019年5月刚实行的温度单位的国际新定义；还会在书本知识相应处介绍2021年关于焓的新国家标准、讲述最新低碳发电方式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优势……在她看来，“科研结合基础知识”并非要求本科同学完全掌握前沿科技，而是引导学生理解某个与课程交接的要点。

“热力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但是老师的课让我感到古老的理论依旧熠熠生辉，让我看到学这门课的意义。”能动系2010届本科毕业生姜曦灼回忆道。

二、教学比天大

对于史琳来讲，课堂是很神圣的地方，不管多疲惫，只要一走上讲台，就能精神焕发。“多年来从不调课缺课”是史琳一贯坚持的，“老师对课程的认真负责，学生们是能体会到的。”史琳说。

有一年，史琳承担的某国家级项目需要她作为负责人前往四川汇报，两天的汇报中间夹了一堂“工程热力学”课，于是她在汇报间隙坐飞机回北京上课。同行对此惊讶不已，直到现在相见，还有人笑着说“史老师可是‘打飞的’回去上课的。”

“在我看来，教学是比天大的事情。”史琳说。

家人的大力支持让史琳得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除上课以外，史琳还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活动，尽可能从不同方面帮助学生。

三、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史琳发现如今同学们更愿意通过邮件和微信与老师交流。于是无论在哪里，只要是在办公状态，史琳的邮件和微信一定开着。某天晚上，已经过了深夜零点，有人在课程群里提问，史琳“秒回”。同学们纷纷打趣说，原来史老师也是“夜猫子”。

“工程热力学”有四次平常小考，史琳有自己的考量——督促学生复盘知识，也通过小测筛选出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有些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学习吃力，但他们也是想学好的，要给他们帮助。”她把部分同学叫到办公室私下辅导，每次2小时，一学期光是这种私下辅导就有许多次。

史琳对研究生的培养也同样颇费心思。目前在中科院工作的能动系2020届博士生冯乐军回忆起和史琳相处的点滴，依旧感慨万千：“史老师的大局观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把我引向正确的科研道路，引领我前行。不管史老师有多忙，都会抽出时间来帮助我解决科研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当时，初入清华的冯乐军面临研究方向的转变等种种挑战，史琳根据他的情况制定了个性化的培养计划，建议他先后担任《热工基础》《工程热力学》的助教，使他对工程热物理领域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为他精心挑选国外的专业书籍供阅读。在科研上，史琳给予冯乐军足够的信任和自由度，并将他安排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锻炼，慢慢地挑起了重任。

硕士生姜曦灼毕业后和史琳依旧保持着联系。在固定见面的咖啡厅，她们找个靠墙的位置，点上蜂蜜柚子茶，在氤氲热气中谈天说地。于姜曦灼而言，史琳是她求学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人。硕士毕业后，姜曦灼出国读博的计划受阻，她回学校找到研究助理的职位。某天在食堂，她和史琳不期而遇，当得知姜曦灼面临困境时，史琳拍了拍她的肩膀，鼓励她把目光放长远。“就好像碰到亲人，史老师拍我那两下把我的心都拍回来了。”谈及此，姜曦灼的语气激动起来，“后来在英国读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都是回想着史老师拍我的那两下，自己挺了过来。”现在，姜曦灼也在高校有了教职并开始带自己的学生，她以史琳的言行为榜样，想把恩师当年给自己的温暖传承下去。

“能和同学们在一起我就特别开心。教师和学生是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关系。”史琳看着窗外，笑得开心，“对人的培养是最值得的。”